

建国以来 武汉经济简史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 编
武汉市经济研究所

武汉出版社



2 021 9989 7

建国以来武汉经济简史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
武汉市经济研究所 编
主 编 吴仲炎 陈梦浓



武汉出版社

建国以来武汉经济简史

JIANGUO YILAI WUHAN JINJI JIANSHI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 编
武汉市经济研究所

主编 吴仲炎 陈梦浓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黄浦路248号)
通信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20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3.80元
ISBN 7—5430—0268—X/K·28

序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40年了。作为这一段历史的实践者、见证人，我个人可以说伴随她奋斗了40年，从武汉解放时参加接管起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参加新的长征，其间既有胜利时的喜悦与体验，也有折腾后的困惑与反思。当我回顾这一段战斗历程时，倍感亲切，激越奋进之情油然而生。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武汉凭借其地理、交通、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已成为开发长江流域经济的重要支点；党和国家对武汉经济建设寄予了更高的期望。英雄的武汉人民应当为中华振兴与湖北中部崛起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既要充分估计到武汉经济继续奋进的良好基础与有利条件，从而增强信心；又要清醒地看到武汉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与肩负的重担，从而提高责任感与使命感！

人们在前进，也就是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这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或在已经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今天是昨天的历史的发展，不懂得历史，就不可能对现状有深刻的理解。当前，我们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然而，在

我们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大国和地区，进行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它的成功和胜利实现，基点要建立在正确认识与对待国情与地情上。20年的“左”的错误的产生，有着种种复杂的原因，如急于求成、盲目求纯、急于过渡、经济过热等等，而这些问题，都同以往我们忽视国情、地情及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一决定方针政策的基本前提有关。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如实承认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我们的具体国情、地情出发，才能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逐步实现现代化。我想，我们不仅要重视对现状的研究，也应该重视对历史的研究；不仅要重视研究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也要重视研究地方社会主义经济史，把历史与现状、宏观与微观、全局与地区有机地联系起来，立足现实，总结过去，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现在与未来，使我们今后的路走得更好些，取得的进步更大些，付出的代价更小些！

我是主张写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建设史的，我也有志于此，为今人与后代提供借鉴。目前，对社会主义时期地方经济史的研究，还处于开拓阶段，《建国以来武汉经济简史》的编写出版，虽然是个初步的尝试，但却做了一件很有益的事。我希望这本书出版后能汲取各方面意见，进一步挖掘、核准史料，继续补充修改，使之日臻完善。

刘惠农

1989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概 述

- 第一节 武汉经济地位的演变 (1)
- 第二节 解放前夕武汉经济全面崩溃 (6)
- 第三节 解放后武汉四十年经济发展的历程 (10)
- 第四节 当代武汉的战略地位与作用 (16)
- 第五节 武汉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展望 (19)

第二章 建立国营经济、稳定市场的斗争

- 第一节 接管城市，建立国营经济 (24)
- 第二节 恢复生产与交通 (27)
- 第三节 平抑物价、稳定市场斗争的胜利 (32)
- 第四节 统一财政经济 (36)

第三章 争取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

- 第一节 调整工商业 (39)
- 第二节 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 (44)
- 第三节 进行失业救济 (49)

第四章 在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中改组与 恢复经济

- 第一节 抗美援朝对生产的推动 (53)
- 第二节 “三反”、“五反”运动 (54)
- 第三节 增产节约运动 (57)

第五章 恢复时期的成就和经验

-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 (63)

第二节	恢复时期的主要经验.....	(65)
第六章	“一五”计划	
第一节	“一五”计划的任务与指标.....	(71)
第二节	集中力量确保重点建设.....	(74)
第三节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改善企业管理.....	(77)
第七章	前三年国民经济的循序渐进	
第一节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	(81)
第二节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普遍试办.....	(88)
第三节	手工业合作社的逐步建立.....	(94)
第四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	(102)
第八章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第一节	基本完成农业合作化.....	(114)
第二节	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116)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121)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调整与巩固工作.....	(123)
第九章	“一五”时期的成就和主要经验	
第一节	“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	(127)
第二节	“一五”时期的主要经验.....	(130)
第十章	“大跃进”和两百项工业建设	
第一节	以“两百项”工业建设为中心的“二五”计划.....	(144)
第二节	以大办钢铁为重要内容的全面“大跃进”.....	(149)
第三节	郊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	(157)
第十一章	纠正“左”倾错误的曲折	
第一节	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 的初步认识及纠正.....	(162)
第二节	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及经济建设中的 新“跃进”.....	(171)
第三节	全市经济形势的被动局面.....	(175)

第十二章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方针的贯彻

- 第一节 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局部调整..... (180)
- 第二节 “八字”方针的全面贯彻..... (186)
- 第三节 三年继续调整任务的圆满完成..... (194)

第十三章 全面进行经济建设时期的成就和经验

- 第一节 在曲折中取得的建设成就..... (205)
- 第二节 主要经验..... (210)

第十四章 迅速恢复的经济建设由逆转到陷入全面混乱

- 第一节 1966年上半年的良好经济形势..... (220)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对经济建设的干扰..... (225)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经济陷于全面混乱..... (227)

第十五章 经济建设从困境中转向回升

- 第一节 “三五”计划的基本完成..... (231)
- 第二节 “四五”计划的制定和开始实施..... (238)
- 第三节 新的经济调整取得成效..... (241)

第十六章 经济建设在动荡中起伏

- 第一节 “批林批孔”运动使经济建设重新恶化..... (247)
- 第二节 贯彻“全面整顿”的方针给经济带来转机..... (250)
- 第三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使经济建设再遭挫折..... (255)

第十七章 “十年动乱”时期武汉经济建设的主要问题及在某些领域的成就

- 第一节 全局性灾难性的恶果..... (258)
- 第二节 某些领域的成就..... (263)

第十八章 在改革开放中前进

- 第一节 农村改革的成功..... (266)
- 第二节 武汉进行综合改革试点..... (270)
- 第三节 企业下放与计划单列..... (275)

第十九章 新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

- 第一节 新时期初期经济结构的失衡状况 (282)
- 第二节 新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 (284)
- 第三节 武汉经济结构调整的反思 (291)

第二十章 武汉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 第一节 战略研究的三个阶段 (300)
- 第二节 武汉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设想 (307)

第二十一章 新时期武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及经验

- 第一节 新时期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315)
- 第二节 新时期武汉建设的重大成就 (319)
- 第三节 十年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经验 (324)

后记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武汉经济地位的演变

武汉位于湖北东部，长江与汉水交汇处，襟江带湖，连接江汉平原。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明末清初已经成为全国内地最大的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地，历来商业辐射面波及江浙湘赣黔川陕等省，甚至远至西藏。所以，汉口在明末成为全国四大名镇①之一，曾被诗人颂为“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的大城市。清道光年间叶调元的《竹枝词·自叙》开章明义地写道：“汉口东带大江，南襟汉水，面临两郡，旁达五省。有贾麋至，百货山积，贸易之钜区也。”他还称道武汉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只为工商帮口异，强分上下八行头”。此时，武汉出现许多“前店后厂”的手工业专业街道，“街名一半店名呼”。②

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资本积累的增多，票号、钱庄应

①汉口镇、朱仙镇、佛山镇、景德镇

②叶调元《汉口竹枝词》

运而生。“子金按日按时排，生意无如票号佳，街上不居居巷内，门悬三字小金牌。”①四方富商大贾——山西票号、江浙钱庄、安徽盐商、四川土产号、云贵矿山的经营商云集武汉，大批破产农民拥向城市，使武汉三镇人口猛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②

公元1858年，清朝政府和英国签订《中英条约》，开辟汉口为商埠，法、美、德、日等国也接踵而来。他们在汉口辟租界、设领事、开航道、兴洋行、建工厂、办银行，把农产品集散地的汉口，改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向我国内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水陆码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满清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绝境，一些励精图治的官僚和实业家，从挽救满清王朝或民族的危机出发，搞起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

自1890年起，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湖广总督张之洞首先在武汉兴办了一些军工和民用的近代化工业。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将原拟在广东建立的枪炮厂，改建于汉阳龟山北麓（今国棉一厂处）。1894年（光绪二十年），加建炮架、炮弹、枪弹三厂。1898年，在汉阳城外的赫山兴建罐子钢、无烟药两厂。这是我国第一座具有完备系统的大规模的军工厂，也就是抗战前汉阳兵工厂的前身。炼铁厂从1890年于汉阳龟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大体完工，1894年6月开炉炼钢。1892年广东的织布局移入武昌建成开工。1894年，张之洞在文昌门外增设纺纱厂。同年，在武昌望山

①②叶调元《汉口竹枝词》

门外办起了湖北缫丝局。1898年，又在武昌平湖门外创设湖北制麻局。此外，还在武汉创建了银元局、铜元局、制革局、造纸厂、毡呢厂、官砖厂、印刷厂、针钉厂、铁路机厂等。并在交通、邮电、商业、财政等方面也举办了一些新政。从1890年到辛亥革命前夕的20年中，武汉官办与官商合办的工厂共有17个，占全国这类工厂总数的17%。

在帝国主义入侵武汉的刺激和洋务运动在武汉兴起的激荡下，在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威胁下，清政府被迫推行“新政”，命令各省举办民营实业，在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后，武汉地区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1896年创办的兴商砖茶厂和美盛榨油厂，1897年创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这是俄商1863年开办顺丰砖茶厂之后民族资本最先创办的近代工厂。到辛亥革命前夕，武汉已有41家工厂，资本总额约1千多万银两。武汉成为全国第二个近代工业基地。

在万商云集的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是商业、金融资本家。汉口是全国外贸转口中心之一。在辛亥革命前10年，对外贸易额经常保持在1亿3千万银两左右，对外贸易占全国第二位。巨大的转口贸易和对外贸易带来了这个城市商业的畸形繁荣，也带来了原有商业行帮的活跃，导致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力量的壮大。辛亥革命前夕，汉口有盐行、茶行、药行、�行、油行、什货行、纸行等8大商业行帮，下分130多个行业，总计商家7000户，其中以中小资本家占多数。民族资本金融业，除20多家票号、60多家钱庄外，还出现了中国通商银行汉口分行、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两家现代银行。

在新建一批民族资本工业的同时，手工业作坊、手工业

工场经过一段改组，也重新活跃起来。1909年武汉有手工业作坊4620户，其中最大的铜器行业有830户。有些手工业作坊也开始采用机械生产。1903年京汉铁路和1918年粤汉铁路武株段通车后，民族资本航运业也开始发展。

武昌辛亥革命首义，全国各地纷起响应，一举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与军事中心。当时武汉的生产与市场遭到了兵燹的破坏。1926年北伐军光复武汉，国共合作成立武汉国民政府，武汉在政治上又成为全国的中心。但是，由于军费开支浩大，财政收入短缺，入不敷出，人民购买力很低，因而市场显得萧条。1928年武汉经济曾一度好转，但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加上国内连年战争、水旱灾害的影响，1929年起武汉对外贸易额急剧下降，1928年为1.22亿元，1935年下降为0.45亿元，下降68.11%，连国内埠际贸易额1923年为4.45亿元，1935年下降为2.2亿元，下降50.56%。

抗日战争前夕，随着日本侵华活动的加紧，激起全国人民反日情绪的高涨，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1936年，农村丰收，市场开始好转，武汉经济得以复苏，一些工业品产量有所提高，工业总产值达2亿元左右，进出口贸易达3亿元，货物吞吐量达2000万吨。据《湖北省年鉴》记载：1936年“全区汉口一隅，计有工厂408家，资本约4千万元，占全省总数77%；年产值达1亿5千万元以上，占全省总数44%有奇。”寥寥数语，足以表明武汉工业在全国的显著地位。抗战前汉口有英、美、法、日、德、比等国银行10家，本国银行28家，钱庄74家，银钱兑换店140家，大小银楼约百家。抗战爆发后，武汉又一度成为全国政治、军事、文化

的中心，武汉民族工商业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但是，日军1938年9月进逼武汉，武汉大批工厂迁往西南和西北。据1947年《中国经济年鉴》统计，武汉当时迁往川、湘、桂、陕、黔等地的工厂有256个之多，占全国迁往国统区工厂总数的一半以上。未迁的工厂遭敌人炮火摧毁达12%。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武汉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洗劫。1942年开工的工厂133个，仅及战前的25%，产值为战前的15.8%；发电能力8685千瓦，为战前的19%。日伪当局对市场物资实行超经济垄断，内外贸易受到严重阻碍，商业衰落，经济萧条，武汉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解放以前武汉的经济，在不同时期，虽有不同程度的起伏，但总的的趋势是形成了我国内地的经济中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近代史上，武汉是在资本——帝国主义经济的控制下发展起来的，反映了城乡对立和外国资本主义对武汉进行经济侵略的生产关系。而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武汉经济处于枯竭困难的境地。

回顾武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第三产业（商业、运输业、金融业）大于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在工业中，主要是纺织、食品、金属加工3个行业，其户数、职工人数、资本额分别占全市工业比重的73%、89%、81%。在商业中，主要是纺织、食品、百货3个行业，其户数、职工人数、资本额分别占全市商业比重的61%、65%、74%。全市民族工业中，中小型多，大型少。广大中小工商业者同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汉民族工商业者既受上海市场的影响，又受农村经济的制约。在武汉工商业者中约有60—70%

兼地主。

武汉民族资产阶级诞生时，资金短缺，对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依赖性较大，以后又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排挤和夹缝中，苟延残喘，拼命挣扎。

第二节。解放前夕武汉经济全面崩溃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劫收”的基础上，官僚资本恶性膨胀。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接收日伪银行、工厂、铁路、矿山、航空和公共事业中，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垄断了武汉地区的金融、资源和重要工商业，如十一兵工厂、二十六兵工厂、武汉被服厂、海军第一工厂和第二工厂等在被接收后加以扩建，成为国民党军队打内战的军需供给点。华中钢铁公司是在汉冶萍公司和日本利铁株式会社的基础上改建的。既济水电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则被宋子文所控制。其它如接收所得的民生茶叶公司、应城石膏公司、民生贸易公司，都被官僚资本集团以“统购统销”的名义所垄断。据当时报纸披露：“武汉接收敌伪工厂一〇三个单位，以三十四年十一月份物价估计，总数在八十亿元以上。可是这些工厂，大部分都拨交省营和国营，其中交省营的五十六个单位，交中央的十个单位，市政府三个单位，机件设备拆迁集中保管的占二十单位，发还民营的只有九单位，而标售与后方复员工厂经营的更少得可怜，仅仅五单位。”①

①林西《武汉工业透视》，《文汇报》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

美国商品和美国“援华”物资大量倾入，给我国民族工业的打击是带毁灭性的。国民党政府接受大量美援棉花，降低进口税率（应征税70%，减征为40%），剥夺了湖北产棉区广大棉农的生计。使用美援棉花纺成的纱，或织成的布，必须交给政府，以换取政府配发的原料，使纱厂完全成为政府附庸的生产机构。①在美货和官僚资本双重打击下，使开始有所恢复的武汉民族工商业大批破产。1946年8月，汉口商户有2万家，到10月，只剩下17000家。10月15日到20日，汉口的公司、行号倒闭117家。工业方面更不景气，到1946年底，大小烟厂关闭90%，大小棉织工厂关闭75%；染织厂在1946年10月有300多家，在一个月内就关了200家。1947年9月，武汉工业只有459家，不仅没有恢复到抗战前516家的数量，而且生产规模也大为减少。由于工厂、商店倒闭，大量工人、店员失业，仅1946年1月统计，失业工人就达6万多人。②

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军费浩大，各级官吏贪污腐化，入不敷出，连年出现巨大财政赤字，于是开动机器，滥发钞票，导致物价飞涨，法币急剧贬值。1948年8月和抗日战争前夕的1937年6月相比，武汉物价上涨424万倍。

由于法币变成废纸，于是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废止法币，发行金元券，并规定黄金、银元禁止流通，迫使人们将金银兑换成金元券。1948年10月底，据国民党中央银行汉

①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281页。

②《大刚报》1946年7月14日。

口分行统计，武汉收兑黄金473614两，白银551882两，银元5205915元。由于金元券大量发行，迅速贬值，继上海之后，武汉从1948年10月2日起，首先从绸布、百货行业开始，出现了抢购风。10月5日，国货公司（现中心百货商店）、大中华橡胶公司等均遭抢购，许多商店被抢购一空。

国民党政府滥发金元券，最高面额从100元增到10万元，发行总额在9个月内达到130亿元。1948年8月20日，汉口市场金元券100元可买14袋面粉，12月只能买到7斤面粉，到1949年5月只能买到千分之一的馒头。汉口二机米，1949年1月5日，每担金元券46000元，到2月5日每担涨到100万元，到3月5日，每担涨到5200万元。^①仅仅两个月时间，二机米就上涨1100多倍。

武汉地区和湖北全省，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国民党政府抓丁拉夫，增租增捐，使农民更加贫困化。连年来，水旱灾害频仍。1946年4月，国统区灾民达3000万人，其中湖北达200万人。1945年秋，长江涨水，公安、石首等县被淹农田达43万余亩，灾民达26万人，饿渴而死的达8万人。1948年，湖北农田遭受水灾达985万余亩，灾民达478.8万人。

解放前夕，武汉的基础设施极为薄弱，公用企业仅有公共汽车管理处、汉口既济水电公司、鄂南电力公司、轮渡管理处等。公用汽车管理处在册的营运车辆只有13台，运输卡车只有1辆。其中可以行驶的车辆仅4台。这些车辆，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当时武汉市民编了一首歌谣，讽刺地说：

^①《武汉近代货币史料》第249页。